

不能承受的时代之重 ——“重写文学史”的回望与反思

林业锦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南宁 5330007)

摘要:通过回顾与反思“重写文学史”的缺陷与偏狭,在理论上注重文学历史现场的还原,注重文学与特定历史的重要联系;实践上将晚清小说、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纳入“重评”视野,最大限度还原和丰富“重写文学史”内涵。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审美;意识形态;反思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4)08-0004-02

从1988年提出到现在,“重写文学史”已有20多年。这个命题经历了开始时的跃跃欲试,到巅峰时的狂热,再到落潮后的困惑,给研究界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又滋生出一系列复杂的问题。1989年“重写文学史”口号的叫停,迫使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

一、理论建构的模糊

“重写文学史”是上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思潮之一,是1988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提出的文学口号。这一口号引起学界广泛的论争,使旧有的文学史格局、格式被打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思路和方法。但其自身理论的模糊和实践的偏颇,又使这一命题走向了封闭和偏执。

“重写文学史”暗含了一种被压抑的、文学独立于意识形态的爆发,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意义。“正是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1]。于是,“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们从理论到实践(作品)上设法验证命题存在的合理性。

毋庸置疑,“重写文学史”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清新的研究文学的方法,让人们看到以往的文学受政治因素的束缚而忽略了文学主体审美性的一面。但“重评”之后,又不免陷入了某种二元对立的困境。

理论上,首先是“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去政治化”标准的模糊和“审美独立性”标准的偏狭。实际上文学并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一切事物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所以对于文学来说,问题不在于写不写政治,关键看它怎么写。如果文学依附于政治,成为政治的附庸,比如“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则成为政治的

工具,其作家主体性和作品的审美属性甚至是基本人性也就丧失了。反之,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但不是脱离),保持作家独立个性的作品如“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在反拨极左政治的同时,也获得了极高的独立性和审美性。但可惜的是,“重评”者在重新评价作家作品时,以一元的“审美”标准代替了多元标准,凡是明显和政治相关的作家作品统统被贬低或直接被忽略。如关于“赵树理现象”的认识,关于“柳青现象”的启示等,都被简单认为是“政治化”写作、缺乏独立的“审美性”而遭到贬低。然而其中包含的问题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从近些年关于赵树理和柳青等作家的评论可以看出其作品意义的重大。

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历史现场感的隔阂。重新评价以往的文学作品虽然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但我们不禁会质疑:这些文学作品的历史含义怎样界定?我们不应该越过历史的现场而完全以当下的眼光去看待昔日的文学作品,即使不能完全地还原历史,但至少做到客观。董健曾指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不能遮蔽历史,更不能改写或歪曲历史。‘五四’时期、30年代、40年代、建国后十七年……这些不同段落的历史都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等着我们去开掘。……开放的、封闭的、自由民主的、专制主义的……都会带入21世纪,让未来者去继续做出批判与鉴别吧。”这是尊重历史,对文学负责的体现,也是对历史现场感的重视。以此反观“重写文学史”,“重评”者们也应该对历史现场给予足够的重视,应该摒除那种否定、排斥历史的史学态度,将文学文本放回特定历史的场域里去考察。秉持这种态度去“重写”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十七年”和“文革”文学都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

收稿日期:2014-08-09

作者简介:林业锦(1985—),男,广西贵港人,广西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部分,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想象民族和国家觉醒的一个基本环节。最先提倡“‘重返’新时期”的李杨也批评“重写文学史”有意贬斥和忽略“七十年代”和“文革”文学造成了文学史的“断裂”^[2]。李杨的这种指责正是空穴来风,恰恰是击中了“重写文学史”者们的要害,即对于“红色”作品和“左倾”作品或思潮的研究一直以来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只是以一种模糊的标准取代历史的批评。“重写文学史”的践行者们却似乎忽略了与历史的联系,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部文学史没有收录甚至有意忽略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和柳青的《创业史》这类作品。如果将这类作品放回历史现场,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种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冲突和政治交织在一起,极大地还原了一个充满阶级矛盾和斗争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而文学恰好就是这种现代化激进政治的载体。

二、文本实践的偏颇

首先是对晚清小说的忽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萌芽始于清末民初,是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艰难时期,传统文化在与现代化的冲撞不断消隐,加上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衍生出一种新旧杂陈、众声喧哗的局面。晚清文学长期以来被掩盖在“五四”文学的成就之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然而作为过渡期的晚清文学意义也是非凡的,正如王德威所言:“过渡意义,大于一切。……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王德威如此推崇晚清文学的重要性是有道理的。单从文学成就上看,就有晚清四大类小说: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和《孽海花》,公案小说《老残游记》,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等。这些作品都暗含着文学现代性的萌芽。这种新旧交替的过渡格局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及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学由来已久。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和多元共生,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诉求和呼声日益强烈。从“重写文学史”这方面来说,以“多民族文学史观”来整合主流文学和边缘文学二元对立的陈旧史观,无疑是一种拓展和实践。然而就当是的“重写文学史”而言,这一理念是缺乏的。纵观那个时期的文学史样本,几乎都忽略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评价和收录。就连最具审美个性的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没有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归纳和整理。他虽然收录了史诗《阿诗玛》和老舍的《正红旗下》,但

只是作为民间立场和民间精神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离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相去甚远。这是“重写文学史”在实践上的又一个缺失。

再者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缺席。近年来国外汉学研究或华文文学研究热闹非凡,在世界汉学语境下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意义重大,它甚至可以为“重写文学史”提供另一种实践的可能性,或至少起到补充和丰富原有文学史的作用。海外华文文学包括大陆、香港、台湾以外的用中文创作的文学,通过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多向交流,在突出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立性和本土性的同时,也可以获得文学多元共生、双重传统互补的“众声喧哗”效果。然而可惜的是,“重评”者们却忽略了这一块。他们几乎都将香港、台湾文学贬斥为“边缘”文学而不予收录,独视大陆文学为正统和主流。港台文学犹且如此,海外华文文学更不必言。举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例,里面清一色为大陆文学,港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收编率为零,这就使得文学史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大大缩小,其引起后人的非议也在情理之中了。“重评”者们没有收录海外华文文学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海外华文文学水平参差不齐。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应该秉持一种开阔包容的文学史视野,不应因作品水平的高低而打破文学史的完整性。

三、小结

不断从理论到实践上反思“重写文学史”,虽然其存在缺陷和不足,但并不能否定它应有的合理性。相反,对“重写文学史”的得与失不断反思,无疑为重新理解的“重写文学史”注入开放性与可能性。因此,“对‘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乃至这一行为本身进行反省,不仅在理论上是必须的,而且可以在实践上为再次开启‘重写文学史’的尝试创造条件”^[3]。历史是一个不断重写的过程,总是由前人提供材料或借鉴,后人改写或补充,但是我们应该尽量做到叙述上的客观。

“重写”文学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无穷无尽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问题与困惑的过程,但只要有着历史理性的反思,我们将获得新的启迪与突围。

参考文献

- [1]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J].上海文论,1988,(4): 25-26.
- [2] 李杨,洪子诚.与李杨就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J].文学评论,2002,(3): 21-33.
- [3] 王俊.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57-63.

(责任编辑:梁士奇)